提籃橋・提籃橋監獄

往事鈎沉

陸茂清

不論舊時還是現在，上海市民中有一句流行語：「當心進提籃橋！」那是用來警告惹是生非者的。

所說的「提籃橋」，指的是上海提籃橋監獄。

提籃橋監獄號稱「遠東第一大監獄」，因監獄開設在提籃橋而得名。

清朝中葉，此處有一條流入黃浦江的小河——下海浦，小河北邊有古剎下海佛寺。居住河南的農夫、漁民中，多有信奉菩薩的，爲燒香參佛方便，有的出力有的出錢，在河上建造了一座木橋。

去下海廟拜佛進香的信徒們，習慣於將香燭、供物放在竹籃裡，拎着過橋去廟裡。每逢初一、月半及菩薩誕辰，木橋上提籃香客川流不息，形成了一道特殊的風景線。當時是有橋無名，便有人叫它爲「提籃橋」，隨着時間推移，漸漸爲公衆所接受，「提籃橋」遠近皆知。對此，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的《上海辭典》有載：「提籃橋……河之北有下海廟，當時農民漁夫爲來廟燒香，修一木橋，供提籃燒香者行走，故名。」

鴉片釁起，外國勢力侵入上海。同治二年（公元一八六三年），美租界當局越界築路，塡平下海浦，拆除提籃橋，圈地造房。提籃橋所在地逐漸建設成了繁華地帶，後來成爲英美聯合掌控的公共租界一部分。

雖然提籃橋已不復存在，但提籃橋之名猶存，所不同的是，由橋名變成了地名，原提籃橋附近地區統稱提籃橋，如今的虹口區東大名路（公平路以東）至楊樹浦路一帶便是。其間還出現了多個以提籃橋命名的事物，如提籃橋區、提籃橋街道辦事處、提籃橋派出所、提籃橋車站、提籃橋郵政支局、工商銀行提籃橋分行，還有中外聞名的提籃橋監獄。

一九〇〇年，公共租界工部局提請在提籃橋地區建造監獄，次年破土動工，至一九〇三年五月中旬投入使用，定名爲「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監獄」。因坐落於華德路（今長陽路），又名「華德路監獄」，市民則俗稱「提籃橋監獄」。當時整個監獄二幢四層監樓，按美國監獄樣式設計，每層六十間背靠背排列，共有囚室四百八十間。

自一九一六年起，提籃橋監獄逐步擴建，至一九三五年基本形成今日規模，佔地六十畝，建築面積七萬多平方米，四周砌有五米多高大圍牆，擁有十幢四至六層監樓共計四千間囚室，還有處決犯人的室內、室外刑場，及工場、醫院、食堂、辦公樓等。由於它建築精良，規模宏大，收押犯人數量多，大於印度的孟買監獄和日本的巢鴨監獄，被稱爲「遠東第一監獄」。

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獨佔了上海租界，於一九四二年一月接管提籃橋監獄，命名爲「上海共同租界工總局華德路刑務所」，一九四三年八月由汪僞政權接管，隸屬司法行政部，改稱「司法行政部直轄上海市監獄」。抗戰勝利，國民政府於一九四五年九月接收後，繼續使用「司法行政部直轄上海市監獄」的名稱。中共進入上海後的一九四九年五月底，由市軍管會法院接管，改名「上海市人民法院監獄」，一九五一年七月改屬市公安局，名稱改爲「上海監獄」，八月再改爲「上海市監獄」。

從清末至上世紀九十年代，近百年中政權更迭，上海屢次易主，監獄名稱頻頻變換，但市民始終仍稱「提籃橋監獄」，執著不變。

是民意的勝利吧，一九九五年六月，終於更名爲「上海市提籃橋監獄」至今。以後是否再度改名，難以料及，但即使改的話，也必民衆仍叫「提籃橋監獄」到永遠。

和童心重逢

文化什錦

嚴方正

黃穎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編輯，他們做兒童綜合類百科全書時，希望從「培養兒童尋找知識的興趣、方法、習慣」入手，努力實現圖書的「好玩、有趣、有用」。編書的第一步就是要收集兒童的問題。出版社總編輯及時提出了「提問是創新的開始」「讓兒童提出更多的問題」「爲國家培養更多的有創新思維的人才」的編輯理念。有了方向，他們逐漸理清了思路，從二〇〇七年開始，陸續推出了《中國兒童好問題百科全書》（非拼音版）、《中國兒童好問題百科全書》（拼音版）、《小學生解除煩惱的100種辦法》。其中，《中國兒童好問題百科全書》系列一出版就成爲當年的優秀暢銷書。黃穎想，八年過去了，他們必須適時推出新的「問題」書。而新的「問題」書如果一味墨守成規必遭淘汰，一味迎合市場又不符合出版社一貫的編輯理念。但總的原則不能變：要貼近兒童，用兒童的視角看問題。

孩子求知的驅動力不是功利心，而是好奇心。記得日本作家黑柳徹子在《窗邊的小豆豆》中講到，一個「問題小孩」，他不停地反覆揭開桌子的蓋子，關上，再揭開……後來，孩子的母親解釋，原來家裡的抽屜是推拉的，只有學校的桌子是向上揭蓋子的，所以她很好奇。

好奇的孩子常常挑戰「規則」。一位幼教老師說，下雨的時候，她班上一個小男孩就專挑地面微傾的雨坑走，最後被奶奶打了一頓。其實在那部《粉紅豬小妹》動畫片裡，佩佩豬最喜歡的遊戲就是跳水坑，她的爸爸媽媽就爲她們全家準備好雨鞋，一起跳水坑玩。實際上，如果不能以孩子的視角來看問題，理解他們，就會不停地指責，禁止，最終傷了孩子。

肯定孩子的獨立見解是幼教的原則之一。一位媽媽非常高興地告訴別人：「我兒子今天受到老師表揚了。在美術活動時，我兒子拿着他畫的『小兔的一家』給老師。老師看了看說：『畫得很漂亮，怎麼還有一個蘿蔔沒塗色啊？』這時，我兒子詫異地望着老師說：『這是白蘿蔔啊！』於是，老師誇我兒子聰明，因爲一個班只有他畫了白蘿蔔！」很顯然，這位教師貼近了孩子的視角。

應當告訴孩子，遊戲是好的，但傷害別人是不好的。加拿大有個眞實案件。有個小男孩玩彈弓，不小心射瞎別人一隻眼。一位資深法官辦理此案時，感到很爲難——如何處置肇事男孩？既不能直接追究其法律責任，又要讓他從中吸取教訓，而採取的方式還不能對孩子造成實質性傷害。法官想了很久，決定判罰這男孩在三個月之內，在公共場合必須用眼罩遮住一隻眼睛……不到半個月，男孩在一篇作文中，由衷地懺悔了當初行爲的過錯，眞切體會到自己的過失給他人帶來的傷害，以及這種傷害在後果上的嚴重性。

你一天天長大，成爲一個有能力自己找尋幸福的人。幸福的樣狀有萬千種，可以是舌尖的愉悅，可以是愛情的滋潤，可以是學富五車，可以是事業有成。別忘了，還有那麼一樣，就是和童心重逢。

悠悠歲月古街長

流動空間

方　元

一座城市的誕生是從修建第一條街道開始的。香港的這條古街叫作「荷李活道」。它位於港島的中環和上環。別看它其貌不揚、窄窄的、長度僅有一公里，但它是香港殖民化的起點，它與英治的歷史一樣長。

冬青樹與荷李活

「荷李活道」建於一八四一年，是英國人侵佔香港後最早修建的一條道路。在殖民化的過程中，外來殖民者對城鎮空間的重建是非常重要的步驟。當軍事佔領行動完成之後，城市的規劃建設便成爲建立和穩固殖民統治的必要基礎。在城市形態的進化中，最先開拓的就是道路。所以，如果想了解香港城市的殖民化歷史，那麼我們可以從「荷李活道」開始，邁出認知的第一步。

荷李活道上的百年古牆　姜燕攝

現在的人們只知道「荷李活道」是一條文化街，以古董店和畫廊聞名，而忘記了它早先的軍事用途。在十九世紀中葉，街的西端是「水坑口」，那裡是軍艦運送兵員和物資的碼頭，附近是英軍駐地「西營盤」，街的東段有警隊總部和「域多利監獄」，再向東便是「域多利兵營」。所以這是一條重要的軍事補給線。

今日的「荷李活道公園」即是「水坑口」的舊址。那裡是英軍第一次在香港島登陸和升旗的地方，因此英國人把它命名爲「Possession Point」——佔領角。在公園的旁邊，與「荷李活道」垂直相交的一條路即叫作「Possession Point」。它的中文路名在早期被譯作「波些臣街」，後來隨華人的稱呼習慣而改名爲「水坑口街」。這種「一街兩制」的路名是香港的一個特點。

「荷李活」的英文原意是冬青樹林（Hollywood）。傳說當年道路的兩旁長滿冬青樹，因而取名「Hollywood Road」。街道的中文名字沒有譯爲「冬青樹林道」，而是跟隨英語發音，直呼「荷李活道」。港島早期的街道，多是以英國的人名、爵位命名，因而採用音譯。以樹木命名，並採用音譯的僅有「荷李活道」一例。

其實，它有過一個地地道道的中文名字。在這條街上有一座文武廟，因此在開埠的早期，華人習慣稱它「文武廟直街」。但這個路名未能保留下來。根據官方的講法，文武廟建於一八四七年。但也有學者認爲，文武廟創建的年代早於一八四一年。究竟是先有「荷李活道」，還是先有「文武廟直街」，現已無從考證。

殖民地的歷史是從殖民者到來之時開始書寫的，而在此之前的歷史總是被空白的。以英軍修築的道路作爲香港的第一街，旨在表明香港的歷史是由英國人開創的，從而爲殖民統治貼上「合法」的標籤。香港人在接受這個講法的時候，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已被殖民主義歷史觀洗了腦。甚至一些政客和學者現在仍在推銷這種錯誤的歷史觀。這也是「去殖化」在香港舉步艱難的一個原因。

殖民者的新地圖

英國殖民地的第一條街道通常都是以維多利亞女王命名。但是爲什麼香港的第一條道路不是以英女王命名，而是「荷李活道」呢？

根據歷史資料，一八四一年有兩條道路在同時修建：一條在山坡上，即是現在的「荷李活道」；一條沿着海邊，即是現在的「皇后大道」。換句話說，當時完全有條件讓「皇后大道」成爲香港的第一街。

據我推測，當英軍在香港修築道路時，中英兩國使臣正坐在南京下關江面的軍艦上，尚未就《南京條約》達成協議。於是，本應是第一條命名的道路——「皇后大道」，由於要等待條約的正式簽署，因而被推遲到一八四二年，以便使它的命名合法。有的資料把「皇后大道」稱作香港的第一街，大概是考慮到在香港正式成爲英國殖民地之後，它是第一條官方命名的道路。然而，這兩條「第一街」在簽約之前即已非法開工的事實，是不能抵賴的。

「皇后大道」即使不是第一條建成的道路，但作爲當時港島最長的街道，以及兩大印鈔銀行總部的所在地，其「第一街」的稱號當之無愧。在香港，以維多利亞女王命名的地名多過十處。西方和香港一些傳媒經常批評中國人搞「個人崇拜」，其實英國人在此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

對一塊土地的開發權和命名權，顯示了誰是土地的所有者。儘管殖民地不是英國本土，但也屬於「大英帝國」。因而，那些以英國王室成員、英國地名，以及殖民地總督命名的街道，最能體現殖民地的特點。例如，以英國君王命名的「皇后大道」、「英皇道」，以英國地名命名的「劍橋道」、「約道」，以港督名字命名的「羅便臣道」、「堅尼地道」等等。通過這種方式，殖民主義統治者勾畫出一幅新的地圖，從而宣示自己的合法性和佔有權。

語言是權力符號

把語言用作權力的符號，這是殖民統治的一個重要特徵。英文作爲支配性語言，被列作「官方語言」、「標準語言」、「法律語言」，而中文被降格爲輔助性語言，受到貶低和壓制。這種語言與權力的關係在路牌上也可以看到。例如英文的「冬青樹」被翻譯成中文的「荷李活」，三個中文字符相互毫無關聯，不知所謂，沒有任何語義。在此，中文只被當作英文的注音符號，否定了中文的語言地位。

來自歐洲帝國中心的語言如何在遙遠的殖民地保住帝國的「純正」，這是最讓殖民主義統治者牽腸掛肚的事。然而，從殖民地開張的第一天，就出現語言混雜、變質的現象，使女王的「高尚語言」失去了「純正」。

因文化隔閡而產生的誤解和誤譯現象，每天都可以在路牌上看到。例如，「Queen's Road」是指英女王維多利亞，本應譯作「女王大道」，但由於對「Queen」字的誤解，因而譯成了「皇后大道」。這一方面說明兩種語言在轉換過程中，會出現偏差；另一方面也看出，早期的華人譯員可能不了解英國的歷史和制度。這個誤譯直到半個世紀之後，在一八九四年才被英籍官員發現。

我發現，在早期的街名中文翻譯上有一種難以理解的不暢順。這表現爲用字粗俗、古怪、貶損、不易記憶等，例如以英國外相和港督命名的「鴨巴甸街」、「砵甸乍街」、「爹核士街」和「麥當勞道」。在這看似非常隨意的翻譯中，有一種故意的漫不經心。

譯名不統一的問題在早期的中英文街名中最爲明顯。例如「般含道」、「般咸道」和「文咸街」三條道路，雖然名字不同，但並非三個人的名字，其實都是同一個人，即第三任港督Samuel Bonham，而他給自己起的名字是「文翰」。英國慣於以人名命名道路，而中文譯員爲了避免街名混淆，因此出現一個人的名字有多種譯法的怪現象。

英文在翻譯成中文之後，經常會產生歧義。例如，灣仔「鄧肇堅醫院」旁邊有一條「活道」，但並非治病救人的意思。它的粵語音譯來自英文的「Wood」，這個「活」既不是「活命」，也不是「木頭」或「樹林」，而是香港副按察司約翰羅活（John R Wood）的姓氏。類似的例子還有「梅道」、「歌賦街」、「樂活道」等。

中文地名按粵語發音譯成英語的時候，也同樣出現字義和含義轉變的情況，而且有時變得很滑稽。例如：「文發街」拼寫爲「Man Fat Street」，就變成了「肥仔街」；「天龍路」變成了「Tin Lung Road」——錫肺路；「景星街」則是「King Sing Street」——國王在街上賣唱？中英雙語街名是香港殖民地文化的一個特徵。雖然兩種文字寫在一塊路牌上，但並不能消除殖民統治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隔閡。路牌在文法上的混用、在文字上的歧義、在翻譯上的不統一和不規範等等，這種「驢唇不對馬嘴」的現象反映了殖民主義者的文化與當地文化之間存在着一道天然的障礙、一條天然的國界。所以，宗主國不可能把自己的文化模式完全照搬到殖民地，不得不進行改寫和混雜，這就爲以後的殖民主義解構和歷史重寫埋下了伏筆。然而，要重新構築被殖民統治破壞的歷史和文化，香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傑出歌手

人生在線

喻麗清

依演化論來看，地球上最早的聲音是蟲鳴，第二種聲音就是青蛙的合唱，直到現在，這求偶的前奏曲，還是辨識蛙類的方法之一。不過，對現代人而言，蛙聲倒成了辨識鄉下與都市的方式之一了。至少我是這樣的。

有一天走訪友人，雨後初晴，還不到黃昏時分，到處卻聽見一片蛙鳴。「這簡直是鄉下嘛！」我說。

但是，附近卻都是很現代化的屋子，使人懷疑蛙聲是否人造？因爲，我想起——佛羅里達州有些高級公寓，窗上裝了海景，屋裡設了海浪的音響，使你自以爲住在海邊。

我那一天因偶來的蛙聲，心中充滿了詩意。以前，不明白爲什麼中國人用「蟾蜍」（陸上的蛙）來代表月亮，現在也還是不明白，但至少不再覺得那麼地不相配了——詩意，並不是給人看的或聽的。西洋的童話《青蛙王子》，跟我們的「癩蛤蟆月神」眞有異「曲」同工之妙。這「曲」，可是蛙聲引出來的？我不禁想到。

許多青蛙用的是牠們脹大的喉部或嘴角內鼓起的共鳴囊來擴大音量。不求偶，牠們大概也懶得這麼費事地「交響」，因爲愛情在蛙族裡並不是「娛樂」。

有個寓言說：小青蛙在外頭看見一頭牛，回去跟牠老爸形容那頭牛之巨大。牠老爸就鼓腹如盆，問：「有這麼大嗎？」小青蛙搖頭，老青蛙再運氣鼓腹，更大地膨脹自己，在小青蛙一再的搖頭中，那可憐的老青蛙氣球似的爆炸了。

小時候讀這寓言，以爲它的教訓是，不能不自量力。可是，現在我所感到的悲哀，卻是老青蛙死時，還是不明白那頭牛能有多大。

人造蛙聲，並不困難，困難的是，在心中清楚明白自我的極限時，依然能在眞與幻之間，自由地出入。

歌手是眞的，音樂是幻的，只有大自然好像做什麼都沒有困難的可能，因爲它的極限是無盡的。

地球上出現的第一聲蛙鳴，跟現在的有多少不同？其實我眞想知道。不過，面對知識這頭巨牛，我們恐怕連搖頭的資格也還沒有，鼓腹就只好免了。

人的「智慧基因」爆發期

文化經緯

廖楚強

研究教育心理學的人，發現每個人的「智慧基因」都不同，而各個人的智力發展也有一定的「爆發期」。有的人爆發期很早，甚至在幼兒時代就展現了超凡的智慧，被人稱之爲「神童」。但大部分人的「智慧基因」都是在中年以後，才逐漸爆發出最佳的智慧和才華。人到中年，正是知識積累和社會閱歷非常豐富的時候，再加上自己獨特的「智慧基因」，建功立業，正當其時。

一個人的成長，就拿孔子的話來說：「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這個意思是人要到三十歲以後才能進入成熟而能獨立的階段。由於人的知識和經驗，都已相當豐富，對事物的分析判斷能力也逐漸準確，不至於走上錯誤迷惑的道路。所以一般做大事業的人，都是在三四十歲以後才開始發揮他的傑出的才華。所以一個人的青少年時代，還不能夠輕易斷定他的成功與失敗。因爲他在中年以後，很可能又會經歷一個突飛猛進的時期，這就是他的「智慧基因」爆發了勢不可擋。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學家、發明家愛因斯坦和愛迪生，他們在青年時期，智力非常平凡，連大學都沒考上，但在中年以後，智慧的「火藥庫」爆發了，創建了許多超越時代的科學理論，發明了數百種電器工業產品，爲人類進化史上作出了偉大的貢獻。

除了大部分人的「智慧基因」都是在中年時期爆發，但是很奇怪，人類的大腦是非常複雜，而且又是多種多樣的「生理機器」。甚至有的人在青年中年時期，表現都很平凡，而到了「老年」時期，才突然爆發了他的智慧，創建了偉大的事業。這種人，被人稱爲「大器晚成」。在中國的歷史上，所謂「大器晚成」的事例，歷代都有。而最早的一個歷史人物，就是西周時代的姜尙（即姜子牙），他七十多歲的時候才開始從政，輔佐周武王，擊敗了商朝的末代暴君紂王，奠定了周天下的王業，以後又繼續輔佐周成王，立下了許多戰功，促進了西周初期的繁榮昌盛。所謂「大器晚成」，除了姜子牙之外，在古代的文學界，人們經常提到的是南北朝時代的辭賦家庾信。他早年的詩賦作品被人評爲綺艷輕靡，屬於一般宮廷文學的代表，沒有什麼傑出的成就。但到了他的遲暮之年，越老功力就越好。作品的內容和題材也有創新。從歌頌宮廷貴族的糜爛生活轉向反映廣大人民的呼聲和國家的興衰敗落，其最著名的作品有《哀江南賦》、《枯樹賦》等，都是反映南北朝時代社會的動亂和人民的痛苦，風格也轉變爲蕭瑟蒼涼，非常貼近人民大衆離亂悲痛的心情。所以庾信也是在晚年時代才能在中國的文學界大放異彩。他的《哀江南賦》也成爲留傳千古的一塊文學史上的瑰寶。

人的「智慧基因」，是非常複雜奧妙的生理現象，也有一種人，在各種知識領域都顯得平凡甚至有點「愚昧」，但在某一點上，他卻有特別的才華。這種人被人稱之爲「偏才」或「怪才」。據說前中尖文史館館長蕭乾，他在青年時期投考清華大學，各科的成績都很平凡甚至不及格，唯有英語一科考得最好，而且從考卷中可以看出他對外國語文的研究具有特殊優異的素質。當時如果按照各科成績的平均分數來錄取，蕭乾根本考不上，但當時學校領導卻「慧眼識英雄」，破格錄取了他。後來蕭乾果然成著名的翻譯家，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又成爲中國派往歐洲戰場上的一位最爲出色的戰地記者。

每個人都在各種不同的年齡階段爆發他的「智慧基因」。人生的旅途是漫長的，應有長遠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前程。雖然在某個時期遭到挫折或失敗，但絕對不要恢心，要善於堅持和「韜光養晦」，說不定在某個年齡階段就是你成功的里程碑。至於社會上所聽到的「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這是一種非常錯誤的教育觀點，我們應該群起而抵制之，讓我們下一代兒童自由活潑的成長。